

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

DOI:10.16273/j.cnki.53-1134/d.2023.03.016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百年探索的 多维分析^{*}

李 贇¹, 金炳镐²

(1. 中央民族干部学院 干部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 海淀 100094;
2.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院, 北京 海淀 100081)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的最大成就,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当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及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奠定了坚实可靠的政治保障。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党对该正确道路的理论创新, 需要站在宏观历史的高度从不同视角来多维多向地总结和分析党致力于推进中华民族自觉自醒与自为自强的不懈奋斗的经验, 探索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经验, 探索开拓创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经验, 探索提升党和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和现代化能力等方面的经验, 从而为增强对该正确道路的信心及自觉性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 多维分析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681(2023)03-001-011

作者简介: 李贇, 中央民族干部学院干部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特聘教授,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金炳镐(通讯作者), 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会长, 中国统一战线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 内蒙古自治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内蒙古民族大学)首席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政策。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的最大成就, 就是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从基本内涵、基本经验、根本遵循等不同方面创新和发展这条正确道路, 体现了新时代党对该正确道路的高度理论自信与实践自觉。深刻领悟与正确把握党对该正确道路的创新发展, 需要我们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成、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民族问题的影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党的领导的重要性等多向维度、不同视角,

收稿日期: 2022-09-08

^{*} 基金项目: 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西北地区经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研究”(22JJD850001); 中央民族大学专项课题重点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研究”(2021MDZL01)。

全面、立体地总结党的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发​​展规律。然后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认清我们党致力于探索中华民族自为自强的道路基石, 领悟新时代在世纪大变局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 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时代性要求, 探索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和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 阐明坚持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领导的关键因素, 为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

一、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自为的发展中把握探索民族自强道路的艰巨性与重要性

民族意识的基本构成以民族对自身共同体的认知为中心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内外部关系意识和整体发展意识^①。前者是后者实现自我完善的前提和条件, 后者是前者巩固自身存在的动力和保障。一般来讲, 现代民族意识形成过程按照其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态的认知差异大概可以分为民族自在、民族自觉、民族自为三个阶段^②, 实质上是现代民族发展过程在民族意识上的投射与体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党为之奋斗的初心和使命, 并在争取中华民族实现“三个起来”的奋斗中, 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个过程也是中华民族意识由民族自在意识向民族自觉意识, 进而向民族自为意识飞跃质变的历史过程。

中华民族的自在阶段, 是指中华民族在形成近代国家民族共同体之前的整个历史时期。该阶段中华民族作为统一的中国历史主体的客观整体性的形成发展历程与命运共同体的自我演进规律, 能够回答中华民族由何而来的历史渊源问题, 能够为中华民族内部多样性基础上的整体统一性提供历史根据, 从而理清中国各民族如何形成团结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脉络。抗战时期, 我们党把无产阶级的立场与中华民族及各族人民的民族利益相统一, 充分肯定中国几千年王朝历史时期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历史主体的整体性形成作出的巨大贡献, 科学界定“中华民族”的概念, 肯定“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③。我们党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构成国情的这个正确阐释, 既尊重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国家的历史事实, 又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维护了民族团结进步的时代要求,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根本原则, 是对旧中国夷夏有别的民族观和西方民族主义一族一国的国家观的重大突破和

^① 民族意识的结构和层次分为民族属性意识、民族交往意识和民族发展意识三个方面。民族属性意识与民族交往意识在本质上都是民族对自己共同体内外部关系的认知和认同意识, 故这两者都可以归纳为民族关系意识。实际上, “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自我归属认知意识也是建立在我他关系基础之上的, 无他就不可能有我, 无他之我就只能是一种自在存在状态。参见: 金炳镐. 民族理论通论(修订本)[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 112-115.

^② “民族自在”与“民族自觉”的概念最早是由费孝通先生于1988年香港“泰纳演讲”中提出来的。把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看成是一个由“自在”到“自为”的升华过程的观点, 在国内民族理论学界最早是由熊锡元先生提出。他认为民族意识过程由“自在”到“自为”是一个质的飞跃, 是一个发展规律, 是一个民族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一个民族, 只有在它的民族意识发展到“自为”的高度时, 才有可能跻身于现代文明民族之林, 为全方位地参与社会生活以及解决民族问题创造条件。熊锡元的观点中没有说明在民族意识上“自觉”与“自为”的区别和联系, 或者说他认为“自觉”是“自为”的组成部分。李贲在吸收熊锡元观点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自觉”与“自为”状态进行了区分, 阐述了民族意识形成发展过程中“自在”“自觉”“自为”三个阶段的特点与内涵。参见: 熊锡元. 民族意识过程: 由“自在”到“自为”[J]. 黑龙江民族丛刊, 1999(2): 13-16. 费孝通主编.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李贲. “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逻辑结构和历史意义探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9(9): 23-30.

^③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808.

彻底革新。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阶段为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前提和主体基础。

中华民族的自觉阶段,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时期,是中华民族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通过对外交往交流中与“他者”的对比,产生了对自身共同体存在一体性特征及共同的身份归属感指向的明确清醒的认知,从而形成对别的民族与自身民族共同体的区别与界限的相对稳定与清晰的把握,自觉地在整体族格与民族尊严意识上获得了相对完整与成熟的自我肯定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刻分析帝国主义侵略把封建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①。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②中华民族面临着被征服奴役的危险。我们党激励和团结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③ 共同奋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的政治本质。伟大的抗日战争刺激了全国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并使我们党的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政治地位深入人心。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并于1949年成立了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宣告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把握各族人民团结进步的时代要求,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层面上,提出以“四个现代化”为内涵,赶上和超越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的国家现代化建设目标;在国内个体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层面上,提出以民族平等团结为基础,以推进各族人民全面发展为要旨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目标。全国范围内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得各族人民摆脱了旧的剥削制度的压迫和奴役,成为掌握自己命运和幸福生活的社会主人,并在整体上赋予中华民族以社会主义的民族性质。从1953年至1957年,国家通过民族识别确定了53个少数民族,基本搞清了中华民族内部构成的民族结构,为全面贯彻民族平等政策,增强民族工作的精准性与针对性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些成就,是我们党对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基础上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复杂族情深刻把握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自觉上的反映。

中华民族的自为阶段,就是中华民族通过不懈探索,能够明晰地认识和把握自身作为中国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规律与前进道路的时期,就是其能够积极有为地在此基础上全面系统地规划和推进自己的民族发展战略及族体建设等,从而使自己逐渐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国家民族共同体的时期。我们党对中华民族自为意识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经过百年的探索和奋斗,党终于探明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道路,为中华民族从民族自觉向民族自为飞跃奠定了坚实的道路基础。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党为中华民族开辟的全面复兴之路,是指导中华民族在“站起来”基础上,实现摆脱贫困“富起来”和迈向共同富裕“强起来”的必由之路,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的必由之路。这也是中华民族在民族共同体意识上达到自为状态并以之为基础实现民族自强的体现,是我们在百年变局中趁势稳进的实践底气和理论基础。二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是实现各族人民“两个共同”的必由之路,是我们党探索解决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及其内部民族和谐发展问题,中华民族及其内部民族关系问题,民族与国家及阶级间关系问题等的丰硕成果。我们党具有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0.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2-253.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9.

民族先锋队于一身的独特属性。这是我们始终能够全面系统辩证地从国家民族整体和国内个体民族两个层次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发展趋势, 统领中华民族发展方向, 探索中华民族发展道路的根本保证, 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从自觉到自为的质变的根本保证, 也是我们在新时代增强“四个自信”, 坚定“五个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证。上述两个方面既有各自针对不同层次问题的差异与区别之处, 又有共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重合之处。两个方面之间是互相支撑、互相包涵的关系, 后者是前者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和有机构成, 前者是后者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必然要求和必要内容。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看, 前者是中华民族在共同体自为意识基础上走向自强复兴的必然要求和基本条件, 后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个体民族和谐共生、团结进步的共同体自为意识的集中体现, 是实现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基本条件。这两个方面的基本经验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基本遵循和道路基石, 构成了党的百年民族工作最基本最核心的经验。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两个方面的基本经验, 才能在民族自为的基础上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演变中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性与紧迫性

习近平对新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 是对当前“西降东升、北落南起”的世界格局巨大变化的准确概括。这个大变局主要体现为西方世界的实力和北方富国的地位正在下行, 东方世界和南方穷国的综合国力正在上升, 双方正在形成均衡发展的实力对比局面^①。世界格局正在表现为由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而导致的“非西方化”。近代以来, 西方国家以其先发优势一直主导着世界历史进程。然而, 20 世纪下半叶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 许多非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发展, 综合实力也相应提升。当前, 非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同西方发达国家不相上下, 而且发展势头远好于后者, 在国际舞台上非西方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已经不可替代。持续五百年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一是政治多极化趋势。苏联解体后形成的“一超多强”的大国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现在, 印度已跻身“多强”行列, 美国、欧盟、日本实力相对下降, 中国和俄罗斯实力相对上升, 欧盟和日本逐渐拉开同美国的距离, 寻求更多的自主性。这预示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极世界正加快步伐成为现实。二是世界政治地理重心东移。自东方崛起后, 欧美国家主导世界政治地理重心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20 世纪下半叶后, 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 东亚国家不断兴起, 太平洋世纪逐渐成为现实。当前世界政治地理格局实际上是由东亚、北美和欧洲三个力量中心组成。从长远发展态势来看, 东亚地区的发展潜力远超北美和欧洲。

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地位的上升绝非历史的偶然和幸运, 而是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以实现现代化为奋斗方向, 锲而不舍、千方百计努力领导中国人民赶超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目标的结果。早在 1949 年,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就曾预言: “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②1956 年, 毛泽东在新中国发展目标上对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

^① 张蕴岭主编. 百年大变局: 世界与中国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9: 224.

^② 本书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简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 141.

义国家, 指出中华民族对人类及全世界要做出贡献, 提出要用 50-60 年时间来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发展目标, 并强调实现该目标既是党的责任, 也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要求。完成这个任务, 就能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 邓小平指出, 只有通过改革开放, 才能发展国内经济, 否则“就有可能被开除‘球籍’”^①。他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看成是中华民族享有相应世界地位的保障条件。强调“有理想”, 最重要的“就是爱国主义, 振兴中华民族, 把我们民族发展起来”^②。江泽民指出, 中华民族复兴与 56 个民族的共同振兴, 在主体力量、依靠力量与目标构成上是完全一致的。各族人民要集中共同意志, 强化凝聚力, 调动积极性, 发挥聪明才智, 共同致力于推动祖国繁荣昌盛和民族振兴事业。胡锦涛阐明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对保障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及各民族振兴目标的重要价值和意义^③。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④。

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和发展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世所罕见的速度实现了生产力发展跨越发达国家几百年历程的任务。经过 70 年发展, 2019 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 (GNI) 首次突破 1 万美元大关。到 2020 年底, 全国五个自治区和三个多民族省份的三千多万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建党百年之际, 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并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成就。同时, 我们仍要清醒认识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局限性, 把握好新型大国崛起的系统风险性, 增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忧患意识, 时刻敏锐谨慎清醒地看到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上的不足和短板, 结合自身工作领域的情况, 自觉做好迎接重大风险和准备的准备。党的十九大强调, 要坚决反对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种言行。党的二十大强调,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要求全党要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 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 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 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 增强全民国家安全和素养, 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可见新时代在维护国家安全上斗争锋芒所向, 实际上涉及民族工作领域存在的现实风险和严峻挑战。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⑤, 是国家和民族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和主要体现, 能够发挥引领人心、凝魂聚气、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从根本上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属于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工作。经济建设成就能够为意识形态建设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但不能代替意识形态建设。民族问题具有复杂性和敏感性以及民族因素, 极端民族主义往往利用这些因素, 打着“民族”旗号破坏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我们要改善各民族的民生, 发展经济社会事业满足各族群众物质方面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发展文化教育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方面美好生活的需求, 来反对各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蛊惑和欺骗, 使各族群众在现实发展中亲身感受的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增强“五个认同”紧密

① 罗亚平. 蛇口工业区, 一根“试管”的诞生 [J]. 人民周刊, 2018 (20): 80-81.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思想年谱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328.

③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民族工作文献选编 (2003-2009)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384.

④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2022: 16.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33-34.

结合起来, 警惕和防范极端民族主义及各种错误思想渗透。

三、从社会主要矛盾影响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创新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性与时代性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 国内民族问题也会呈现不同特点和要求, 解决民族问题的重点任务和具体要求也必然不同, 从而导致民族团结的具体内涵与民族进步的阶段目标也会呈现时代性差异。但是, 我们党追求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的初心始终如一,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原则性目标与本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的时代性相结合的要求, 这也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敢于和善于与时俱进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标志。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民族团结的总任务是实现推翻压在中国各族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联合起来共同奋斗。1931年, 中央苏区《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提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国家, 是消灭一切民族间的仇视与成见。”^①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思想的中国化表白。1932年, 《中共四川省委告西藏民族和川边夷民族劳苦群众宣言》指出: “藏、夷、苗、瑶民族的劳苦兄弟们! 为了你们伟大民族解放斗争赶快团结起来, 联合为苏维埃胜利而斗争的中国工农兵士劳苦群众! 只有这样的联合才能战胜共同的敌人。”^②1934年,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 “争取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环绕于苏维埃的周围, 增加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革命力量, 是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③。长征途中, 我们党“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 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 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④。面对日寇侵略, 1934年, 我们党在北上抗日宣言中提出“不分党派、职业、民族、性别、信仰都团结起来, 建立反帝统一战线”^⑤; 指出“一切抗日的民众, 都是我们的同胞, 一切抗日的武装, 都是我们的同伴, 我们都要联合起来”^⑥。1938年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认为, “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之一是“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彝、番等)为统一的力量, 共同抗日图存”^⑦。在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 少数民族统战工作是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 “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 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 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 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 共同对付日寇。”^⑧解放战争时期, 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团结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重要保障和政治任务。1947年,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170.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186.

③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210.

④ 习近平.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10-22 (02).

⑤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219.

⑥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241.

⑦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608.

⑧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595.

中共中央颁布“七七”事变十周年纪念口号提出,“全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一切爱国分子,联合起来组织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反对蒋介石的卖国内战独裁,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①。对一些人以为该时期与抗日时期相比革命统一战线似乎是缩小了的担心,毛泽东明确指出,实际上“只是在现在时期……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才是真正地扩大了”^②。综上所述,在不同阶段革命进程中民族团结进步的具体内涵和任务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但总目标始终围绕着推翻“三座大山”。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工作总任务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阶段性目标的辩证统一关系。党的民族团结纲领的进步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保障我们党始终能代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牢牢地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③,凝聚起各族人民共同追求国家独立统一与民族团结进步的磅礴伟力和共同意志。

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为各民族在新的团结基础上实现全面发展扫清了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受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影响,在认识上混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界限,致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遭受挫折。这既说明了社会总问题对民族问题的制约影响作用,也反映了正确把握民族问题矛盾性质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实际上,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具备了内部民族平等基础与和谐互助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民族关系条件,各民族全面充分发展已经摆脱了剥削阶级和私有制的羁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民族问题就可以忽视甚或排除民族自身发展内容。恰恰相反,能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各民族发展繁荣,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从而使那些因社会发展差距而导致的民族差异性因素不再成为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巨大阻碍,仍然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重要问题。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强调我国各民族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并确定要把加快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任务的深层历史逻辑。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通过对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使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重回发展正轨并获得勃勃生机。在此基础上,江泽民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强调“三个离不开”的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两个共同”的民族工作主题,强调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这些都极大地增强和发展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不懈努力,全国各族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困扰,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富起来”的奋斗目标。在新的发展基础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体现在民族问题上,就是各族人民对祖国强盛的总体向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共同愿景,对幸福生活的期盼与各民族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现状的矛盾。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中华民族建设成为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国家民族共同体,理所当然就成为冲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必然要求,这也是各族群众实现美好生活向往的利益基石、最高呼声和一致愿望。综上所述,确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主线,既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民族问题上的集中体现,也是巩固和夯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生命线的 basic 遵循。只有把铸牢中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1129.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1136.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305-310.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全面充分地反映到推进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上,才能适应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时代需求,才能为巩固和夯实民族团结生命线奠定坚实的人心基础,才能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为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国家民族共同体。

四、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探索历程中把握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长期性与重要性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事务治理经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理论和民族问题理论来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性探索成就,是我们党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建设中实践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纲领的伟大创举。

该项制度的创立,经历了曾主张联邦制和自决权到提出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中华苏维埃时期的1931年和1934年提出了建立“自治区域”“自治区”。红军长征时期建立过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如豫海回民自治政府。抗日战争时期,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提出各族人民联合建立统一国家,通过民族自治实现少数民族自我管理权利的主张。该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区县级进行了蒙古族与回族自治的探索实践,为我们党最终的制度抉择做出了有益尝试,积累了丰富经验。另外,日本帝国主义等国外势力扶植建立伪满洲国等民族分裂政权,外蒙古公决独立及对内蒙古内部形成的消极影响等因素,也促使我们党重新审视民族自决权的实际意义和消极影响,坚定地探索民族区域自治这一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制度的功能。正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党中央对内蒙古问题明确指示:“着重解释蒙汉的联合一致抗日,这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在目前宣传蒙人的独立或分裂,甚至与汉族的统治者对立,这是非常不妥当的”。^①总体来看,承认少数民族自决权及分立权的提法,主要出现在1936年前党的文献中。这些文献在提及承认少数民族建立独立国家权利的同时,也尊重他们自愿选择加入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在联邦内建立民族自治区域。长征胜利后,我们党逐步放弃了民族分立的主张,更多地主张民族自治。解放战争时期,为了能够更加紧密地团结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共同团结奋斗,党中央及时纠正某些民族地区存在的分裂主义势头,并支持少数民族在聚居区域内享有和实施平等自治权利。1947年,党中央委派乌兰夫领导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创造性地开创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省级行政区域的探索实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相关规定,在国家宪法层面体现了对民族区域自治地位的正式确定。这个制度选择的国家意志,同样在1954年《宪法》中得到体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民族区域自治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使民族自治地方名存实亡,“甚至有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辖区任意改变,有的干脆取消。”^②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结合时代发展需求对这项制度在法治化建设方面进行发展完善,使之成为党和国家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基本遵循。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认真总结建国以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教训,全面肯定和高度重视该项制度在维护各族人民享有平等自治权利,推进民族团结和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方面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推进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452.

^② 李资源.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史[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366.

注重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全面发展的实际效益。党中央还认真总结以前“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①的教训,要求要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民族地区依据自身实情变通执行政策的自主权。1982年《宪法》坚持和肯定该项制度的法治化建设方向。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实施,对该制度的法治建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实践中,我们党对该项制度在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逐步深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及2001年新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都明确将其政治地位定位为与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列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这表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已经实现了从党的政策、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化建设。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回答对该制度的各种诘难与否定“可以休矣”,充分肯定其理论先进性与实践优越性,指出要正确把握该项制度统一和自治、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的本质特征,发挥好其在国家民族建设层次上能够起到维护国家团结统一,在国内民族民主政治建设层次上能够起到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权利的制度效能。在推进和完善该项制度法治化建设方面,党中央强调既要在司法实践中抓好对法律相关规定的落实,又要在立法实践中加强对如何规范和完善相关法规和制度的研究。在中央全会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方略中,专门对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提出规划安排。对该法实施情况的专项执法检查,也于2015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用两个月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完成。这些法治建设的做法和内容,成为新时代党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的基本经验和关键环节,被党中央加以肯定和强调。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和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都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中央还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该项制度的基本要求,即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层面满足政令法规实施的统一性和通畅性,要在民族地方发展层面适应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要求,通过支持解决民生问题和急难愁盼问题争取人心,凝聚起各族人民共同追求发展繁荣,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大合力,从而阐明了新时代坚持和完善该制度的根本方向。

五、从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不懈探索中把握坚持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领导的关键性与根本性

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是保障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健康发展的道路基石。这条正确道路包含了党的百年民族工作基本经验的智慧结晶与纲领原则的关键内容,其中最核心和最根本的经验和要求,就是坚持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在价值取向和根本立场上,“党是阶级的代表,也是民族的代表”^②。这落实和体现在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上,就是要不断提升党在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能力和水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为适应各族人民团结进步的要求,制定和实施了服务服从于实现中华民族解放中心任务的民族工作政策,并取得辉煌的工作成就,凝结成该时期党对民族工作领导的基本经验。1925年,党的四大明确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

^①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编著.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九十年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174.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1151.

利”^①。民族问题是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工作是党的重要工作。要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获得中华民族整体的独立与解放,没有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不可能成功;同样,少数民族民众要获得全面彻底解放,也只有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才能最终实现。1934年,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在给内蒙古党组织的信中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去争取成千上万的农民与弱小民族,吸收他们参加中国革命运动才有可能,也只有中国苏维埃革命,才能保证内蒙民众取得解放,与建立他们自己的民众政权与取得真正的和平与自由”^②。正是出于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党在该时期还首次提出并建立了民族工作部门。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为在其他民族工农分子中用其民族语言以便于工作起见,于当地委员会之下设立少数民族工作部。”^③长征途中,红军各部队都成立了专门的民族工作机构。到达陕北后,在边区议会内还设立少数民族委员会,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④。同时,我们党也开始注意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1931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提出:“尽量引进当地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⑤长征途中,党和红军更加重视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1935年毛尔盖会议指出:“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⑥到达陕北后,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延安中央党校在1937年专门举办少数民族班,1939年举办回族干部训练班。1940年在陕北公学成立民族部,1941年创办延安民族学院。解放战争时期,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形式主要是通过革命战争实践,同时也通过开办党校、军事学校和训练班等办法,提高干部的政治和军事水平。根据少数民族干部的特点,在培训时还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党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在全国范围内消除民族歧视与隔阂,进行民族识别,促进民族平等团结,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各民族全面发展繁荣。党和国家还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使各族人民相继摆脱各种剥削、压迫,形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有革命性的社会进步和制度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各族人民向往共同实现“富起来”的现实,牢牢把握住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全面发展的中心任务推进民族工作健康发展。在发展战略的探索方面,形成了“两个大局”的区域差异化发展布局及通过“三步走”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的战略步骤,坚持国家及发达地区帮助与提高自身发展能力相结合的发展原则,实施“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等重大决策,探索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和道路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全面发展上取得历史性进步。在民族工作道路探索方面,邓小平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⑦。这是他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及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角度,深刻揭示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才能逐步解决的发展规律。江泽民、胡锦涛都多次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对毛泽东、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的解决(处理)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进行充分肯定和接续

① 中共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 63.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227.

③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88.

④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463.

⑤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170.

⑥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308.

⑦ 邓小平文选(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86.

探索。在加强党的领导方面，邓小平强调党的团结，特别是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具有核心指引和前提保障的重要作用。江泽民、胡锦涛都从提高民族工作能力和水平角度，强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并且都强调加强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必要性，都从加强领导、加强学习、健全组织、转变作风等方面全面阐述了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标准与培养的方法、途径。这些探索充分说明，能否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是决定我们能否继续走好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关键与前提。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准确把握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确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主线，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各族人民“两个共同”的团结进步事业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强调“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①对此，还作出许多探索。首先，强化主体责任。明确各级党委是领导主体的政治身份，要求其高度重视自身主体责任的落实，在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上走在前列并作出表率。其次，与时俱进地完善党的民族工作新格局。把中央统战部领导国家民委的统一领导优势和国家民委委员制的统筹协调优势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促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再次，加强民族地区基层组织建设。民族地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是党与各族群众日常联系最紧密最频繁的关节点，是各族群众对党的民族工作满意度的检验站。强调要把民族工作力量下沉强化到基层机构建设上，确保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能在基层得到正确的贯彻落实。最后，加强民族地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强调要从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政治决心，提高党的宗旨与使命意识，增强是非鉴别的政治判断力，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执行力等方面造就好干部队伍，把对干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结合起来，吸引更多优秀干部人才投身民族工作。

综上所述，深入总结我们党百年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就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总结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丰富经验，深入总结我们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发展规律，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自为的发展中把握探索民族自强道路的艰巨性与重要性，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演变中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从社会主要矛盾影响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创新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性与时代性，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探索历程中把握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长期性与重要性，从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不懈探索中把握坚持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领导的关键性与根本性，从而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坚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责任编辑：罗添仁）

^①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1-08-29（01）.



金炳镐简介

金炳镐，朝鲜族，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3），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2003），北京市优秀教师（1989、1995），首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004），首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有突出贡献专家（2004）。曾任国家民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马列主义学院首任院长、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首任院长。现任教育部全国民族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学术顾问、国家民委重点研究基地当代民族问题与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研究基地主任。主要从事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民族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在国内外出版著作数十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数百篇。